

第二届革命文物讲解展示交流活动

专业组

(20项,按行政区划排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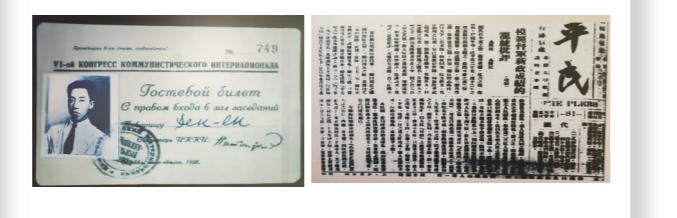
芬芳——《中国妇女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会报》
中的巾帼印记
中国妇女儿童博物馆



藤椅上的决胜时刻
西柏坡纪念馆



“虎啸”传天火 山河证初心
大同市博物馆



黑陶罐见证的荣耀
沈阳“九·一八”历史博物馆



远隔重洋的呐喊——一份报纸与一段不朽的
抗战史诗
吉林省博物院(东北抗日联军纪念馆)



《中国妇女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会报》
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中国妇女运动和妇女解放事业的重要见证物,为一级文物,具有重要历史研究价值和现实宣介意义。1949年由中国妇女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编印,共发行7期,分别为1949年3月24日、3月26日、3月28日、3月30日、4月1日、4月3日、4月9日(终刊号)出版,是中国妇女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盛况的记录与见证。

《中国妇女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会报》记录毛泽东同志“为增加生产,为争取民主权利而斗争”的题词,党中央贺电内容,见证中华全国民主妇女联合会成立,记录蔡畅、邓颖超等领导机构成员的选举过程,以及参会人员的构成情况(411名正式代表)。

内藏乾坤 外铸忠魂
东北烈士纪念馆

抗日交通员陈伟的藤箱,长方形,通体灰黑,长69厘米,宽50厘米,高25厘米,箱体完好,箱内暗藏木板夹层,藏着烽火岁月的红色密码,从1934年起,张宗伟扮成商人,用这箱条幅装秘密文件,奔走于哈尔滨与上海列车间,藤箱见证了他以家为联络站,办秘密印刷厂的坚守,也亲历他面对酷刑的坚贞。1948年,张宗伟妻子阿格拉菲将箱子捐出。虽然它已失去实用功能,但却成为不朽精神载体——是抗日志士用生命护信的见证,是红色交通线的丰碑,更让“忠诚”二字在代代讲述中永远滚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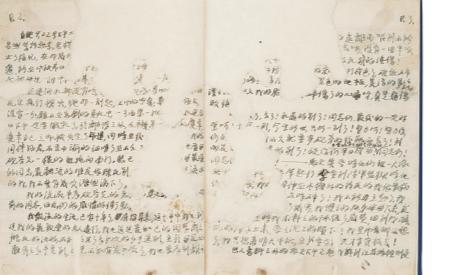
孤岛上的选择
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纪念馆

抗日交通员陈伟的藤箱,长方形,通体灰黑,长69厘米,宽50厘米,高25厘米,箱体完好,箱内暗藏木板夹层,藏着烽火岁月的红色密码,从1934年起,张宗伟扮成商人,用这箱条幅装秘密文件,奔走于哈尔滨与上海列车间,藤箱见证了他以家为联络站,办秘密印刷厂的坚守,也亲历他面对酷刑的坚贞。1948年,张宗伟妻子阿格拉菲将箱子捐出。虽然它已失去实用功能,但却成为不朽精神载体——是抗日志士用生命护信的见证,是红色交通线的丰碑,更让“忠诚”二字在代代讲述中永远滚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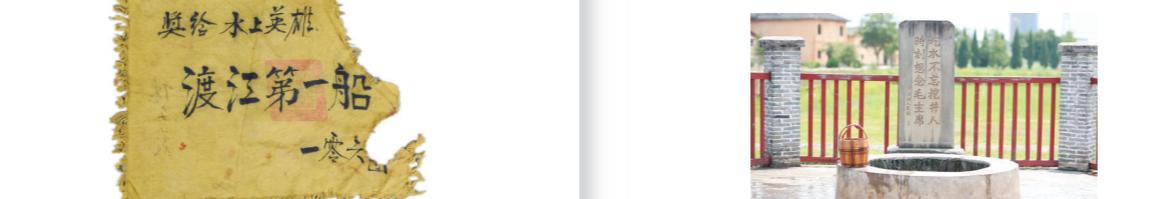
19岁的狱中绝笔
雨花台烈士纪念馆

1939年7月,上海人民在活动中制发的“义卖救难”纪念章,铝制,圆形,正面中间长条式底为白色,“义卖救难”四字为蓝色,长条两旁斜横条式为红色,横条两边为白色斜横线,四角为蓝色衬底,反面为原色(黑色),为一级文物。据中共上海党史研究室编写的《中国共产党在上海(1921-1991)》一书第21页记载:“1939年下半年,义卖成为上海人民为新四军募款的主要方法,当时‘义卖’义演’活动几乎遍及上海工人、职员、学生、妇女各界,其中上海职业妇女俱乐部推出的‘夏令营品慈善义卖’和职业救亡协会主办的上海业余话剧界救亡公演规模最大,最引人注目。”



人民的渡江·人民的胜利
渡江战役纪念馆(安徽名人馆)管理处

1949年渡江战役期间刻发的荣誉锦旗,黄色,长20厘米、宽12厘米,锦旗左上题有“奖给水上英雄”,中部核心位置是“渡江第一船”五字,右侧落款为“‘六四’团,锦旗的主人是渡江战役亲历者陈正华,它是陈正华参与战役的直接见证,也是战役历史的重要见证。1949年4月渡江战役发起时,陈正华作为人民解放军某部突击船成员,承担前线渡江突击任务。他所在的船只在渡江作战中,克服长江江宽流急,敌人火力封锁等困难,率先成功抵达长江南岸,为后续部队登陆开辟了关键通道。为表彰这一功绩,其所属部队一零六团专门授予该锦旗。此锦旗不仅是对陈正华个人英勇表现的表彰,更反映了渡江战役中突击部队的作战特点。



吃水不忘挖井人——瑞金红井
瑞金中央革命根据地纪念馆

1933年4月,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从叶坪搬到沙洲坝以后,中央政府主席毛泽东在元大屋办公和居住,他发现这里的群众喝的是池塘里的脏水,便想解决群众饮水难的问题挂在心上,只要一有空,他就同警卫员小吴商量如何为群众挖井的事。在毛主席的带动下,没几天便挖好了。为了使井水更清洁,毛主席又亲自下井底铺沙、垫木炭。毛主席用实际行动,为机关干部和沙洲坝群众树立了榜样,中央各机关掀起了开挖井水的热潮,沙洲坝人民由此结束了饮用脏塘水的历史,喝上清澈甘甜的井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沙洲坝人民将这口井进行全面整修,并取名为“红井”,在井旁立上一块碑,刻上“吃水不忘挖井人,时刻想念毛主席”14个赤金大字,以此表达对毛主席的无限爱戴和思念。



第二届革命文物讲解展示交流活动精品项目

志愿组

(10项,按行政区划排序)

那抹红 从1927到今天
南昌八一起义纪念馆

南昌起义期间,红领带与带红十字标识的马灯是起义军极具特殊意义的标识文物。因起义军与敌军同属国民革命军,军服样式一致,为在漆黑战场和枪林弹雨中快速分辨友军,战士们以胸前佩戴红领带,马灯玻璃上红十字为识别标志。红领带并非随意选择,在传统文化中它是新生的象征,在战场上更是战士们对旧时代决绝告别,承载着“敢教日月换新天”的信仰宣言。这些简易标识既便于携带隐蔽,又醒目易辨,成为起义军团结作战的“暗号”,见证了战士们“死与它共”的信任与危难时刻的智慧勇气,是红色基因的具体载体,生动诠释了南昌起义的革命精神。



歌声响——抗战歌集《大家唱》
武汉革命博物馆

抗战歌曲集《大家唱》,由曾昭正、李行夫编选,第一集(初版)于1937年10月,由汉口业余歌咏队、武汉群众歌咏队、武汉大学歌咏队联合出版,第二集(初版)于1937年11月出版,为三级文物,长18.5厘米,手掌大小。由武汉小吃老字号“老通城”创始人曾厚诚的长孙、合唱团主编之一的曾昭正之子曾德海捐赠给武汉革命博物馆收藏。洪雪海为《大家唱》第二集前言作序,并把自己的许多作品发表在《大家唱》上。《大家唱》出版后,武汉青年手一册,书店很快销售一空,在全国发行量达到20余万册,成为救亡歌咏运动中发行量最大的歌曲集之一,有力促进了全国人民的救亡运动。



墙缝中的深情——杨开慧家书里的革命信仰
杨开慧纪念馆

一封泛黄残破的书信是杨开慧于1927年秋收起义后,藏于长沙板仓老家卧室墙缝中的绝笔。彼时她与毛泽东失去联系,在白色恐怖中独掌家权,坚持斗争,将对爱人的思念、对革命的赤忱,悉数凝聚于笔端。家书中,“我要哭了”的缠绵,是对伴侣骨肉心的眷恋;“死不瞑目”的铿锵,是对共产主义信仰至死不渝的坚守。儿女情长与革命大义在此交融;她眷恋“小家”的烟火温情,更以生命践行“大家”的信念——用柔骨扛起斗争的重量,以热血浇筑理想的丰碑。这封未寄出的信,是革命年代的情感孤本,更是共产党人“真理理想高于天”的精神正神。它在墙缝中整整埋了100年,却在历史长河里永远激荡着信仰的力量,见证着一位女共产党员对爱的忠贞、对信仰的赤诚,让后人读懂:真正的信仰,从不是抽象的口号,而是融入血脉的坚持与牺牲。



从课堂走向文化抗战的“前线”:凌伯骥
广州博物馆

中国左翼文化总同盟广州分盟(简称广州文总)六烈士墓,位于广东省广州市银河烈士陵园内。墓碑平面呈方形,占地面积96平方米,墓碑材质为花岗岩。主墓碑两侧是刻有烈士简介与烈士墓的石碑,墓碑三面以低矮的石栏杆围护,中间为主通道,内部两侧各置一条形石凳。墓内埋葬着凌伯骥等“广州文总”六位烈士的骸骨。2009年7月,六烈士墓被公布为广州市天河区文物保护单位。中国左翼文化总同盟广州分盟成立于1933年4月,下设“中国左翼社会科学同盟”“中国左翼作家同盟”等组织。凌伯骥是中山大学社会系学生,广州文总负责人之一。1934年1月,凌伯骥等六人被国民党反动派逮捕,同年8月1日英勇就义,他牺牲时未满20岁,是六烈士中年龄最小的一位。



那扇窗 那束光
朱德同志故居纪念馆

朱德同志旧居阁楼上,有一扇由他亲手敞开的方窗。这扇窗折射出朱德同志早年思想觉醒与革命初心萌动的宏大历史进程。讲述者从儿童的视角,融入“五星琳琅山”这一本土意象,以青春化、故事化的语言,赋予革命文物以情感温度与时代气息,让红色历史真正“活”起来,让精神之光“照”进人心。它巧妙连接历史、现实与未来,将朱德个人的奋斗精神与当代“强国有我”的时代强音相结合,有力传承了红色基因,激励了时代新人,实现了文物讲解、历史教育与精神激励的有机统一。



篆刻在印章里的记忆——漫画泰斗华君武
八路军西安办事处纪念馆

“八路军文书上士”印章,长5.1厘米、宽1.5厘米、高3.8厘米,漫画家华君武于2000年捐赠给八路军西安办事处纪念馆。华君武回忆:“1938年11月,我经李克农同志写信给林伯渠同志,介绍我去延安。八路军驻办办事处给我开了护照。因为我从上海来,不像个当兵的,所以我的职务是八路军文书上士。现在我作画并请人刻了一块篆章,‘八路军文书上士’以志纪念。从此我就走上了革命之路。也因此我对八路军办事处怀有一种特殊的感情和怀念。”

